

編者按：涂羽卿博士（1895-1975），物理學家，曾任聖約翰大學校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幹事，也是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的倡導者之一。本文由現居美國紐約的涂氏兒媳涂繼正及李宜華撰寫，讓我們對這位中國基督徒知識分子的一生有更全面的認識。誠如他們所言，這「不僅是一個家庭的苦難，而是千千萬萬忠心耿耿、優秀的中國知識分子的苦難歷程，我們民族慘痛的歷史教訓。」

默默耕耘半世紀

記父親涂羽卿博士的一生

涂繼正 李宜華

負笈渡洋

1914年8月，一艘遠洋客輪從上海黃浦江碼頭啓航，出了吳淞口，駛向大洋彼岸。甲板上，十幾位風華正茂、血氣方剛的中國青年合影留念，其中有以後成爲中國傑出的教育家陳鶴琴、陶行知等人。一生奉獻給中國的教育事業，我的父親，涂羽卿和他們同船。他身材修長、面帶微笑站在後排。那年，他還未滿十九歲。他們整裝待發，飄洋過海，追求振興中華之道。這張珍貴的照片至今保留在陶行知先生的紀念館內。

父親先入美國康奈狄克州衛司理大學，後又入麻省理工學院，主攻土木工程，于1918年6月獲碩士學位。此後的一年，他又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習，同時在紐約中央鐵路公司當實習設計員。1919年回國。

父親原名涂自習，1895年生于湖北漢陽，祖籍湖北黃岡。他出生在一個基督教家庭裡，從小受了洗禮。祖父涂松山是循道公會（Methodist Church）牧師，他有一個比他年長一歲的哥哥，名自學；兩個妹妹，蓮英和瑪麗，年幼夭折；還有一個比他小十六歲的弟弟，名自謙。他們自幼家境貧寒。小學和初中時，他和長兄在漢陽的教會學校就讀。1906年，祖父把他們送到武昌的博文書院就讀。他天資過人，勤奮好學，年年名列前茅。1911年，在他中學畢業前一年，武昌起義一聲炮響，宣告滿清王朝壽終正寢，革命烈火燃遍中華大地，也燃燒在有志青年的胸膛。父親年方十六，心向革命，投入時代的洪流。假期乘

小帆船回漢陽的途中，他和他長兄剪了辮子，扔入江中，眼望 滾滾長江吞沒了這兩條辮子，表示從此和封建主義決裂。

1912 年，他中學畢業後，留校擔任英文教師。但是，他不滿足已有的學業，深造心切，放棄待遇相當不錯的教師工作，投考北京清華學校（注——清華大學前身，起初由清朝政府利用美國退還的部份庚子賠款建立，為公費派送到美國留學的中國青年而設的預備學校）。1913 年，他先經湖北省初試保送進京，又通過清華學校在北京宣武門內學部舉行的入學復試，于當年九月入學。他的學習成績非常突出，尤其是英語水平超優，進入清華學校一年後就畢業了。1914 年，他告別父老鄉親，負笈渡洋。他的兄長已成爲一名牧師，在老家伺奉雙親。

父親在留美時期保持了自幼以來一貫的優異成績，同時積極參與學生組織的各種活動，活躍在文體各方面。這位湖北青年，溫文爾雅，平時不大說話，卻有漂亮的男高音嗓子，拿起五線譜就能唱出從沒學過的曲子。學小提琴，也比其他人學得快。課余，人們又能見到他在網球場一展高手的姿態。在五年的留美生活中，他吸取了西方文明的精華，科學、民主是他嚮往和追求的目標。

學成歸來

1919 年 9 月，父親結束了在美國的工作，國內已爲這些留美學生安排了工作。那時他已和我母親 Muriel Hoopes 結婚，但急于回國報到，告別了新婚的妻子，先行回國，等安頓就緒後，再接妻子來中國。父親學成歸來，躊躇滿志。他到達當時的首都南京後，先後在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及東南大學（中央大學前身）任教。他的好友陳鶴琴和陸志韋（前燕京大學校長）也先後來到南京教書。他們三人志同道合，情似手足。中國需要民主，但教育必須先行。沒有教育，人們就不會懂得民主與科學對一個國家的重要性。他們屬於以教育救國爲主導思想的一代愛國青年。1925 年，孫中山先生去世後，政府決定在南京修建中山陵。父親和其他工程人員承擔了修築市內通往中山陵的林蔭大道。這是他回國後參與的第一項工程，也是唯一的一項工程。他一生的心血奉獻給了他最熱愛的事業——中國的教育事業。

父親在南京的教書生涯過得很平靜、舒坦。1925年，我大姐蓮英出生在南京。1927年，爆發了國內第一次革命戰爭，南京一片混亂。父母親拋棄了南京的家，帶兩歲的女兒來到上海，後來進入滬江大學任教。1930年他獲洛克菲勒基金會獎學金，再度赴美到芝加哥大學深造，從師于阿瑟·康普頓教授（1927年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後來參與製造美國第一顆原子彈）攻讀原子物理。1932年，他獲物理學博士學位後回國，繼續在滬江大學任教並任物理系主任。我二姐長松、妹妹涂省和我都出生在滬江大學的校園裡。我們一家六口在滬江大學校園裡的生活，溫馨又美滿。

良師益友

父親治學嚴謹，他對學生循循善誘，關懷備至。他認為，為師之道不僅在於傳授知識，而且在於教育青年為人之道。他常以自己做人的原則教育學生：“以光明磊落為幟，以追求真理為標；創導科學精神，探索科學價值；貢獻于社會，造福于人類和平”。學生稱他為良師益友，感謝他語重心長的教誨。

他的教學方法不僅重視理論，而且強調實踐。為教學和科研需要，他親自為學生製作許多實驗設備。凡是聽過他課的學生都記得他啟發式的教學方法，講課生動活潑，條理清楚，深入淺出，在校內有口皆碑。上課時，他神態嚴肅，一絲不苟，課後，平易近人和學生們談笑風生。他幾十年在教育園地的耕耘，收穫了桃李滿天下，許多他的學生日後在科技界、教育界做出卓越的貢獻。前復旦大學校長，謝希德就是其中之一。

1937年，“八一三”日寇佔領上海。滬江大學地處楊樹浦，瀕臨黃浦江，先被日軍佔領。八月十二日傍晚，校長劉湛恩緊急通知全體教職員工撤離學校。我父母親，帶我們四個年幼的孩子，提了兩隻網籃，連夜逃到上海法租界裡。我們在滬江大學的家，被日寇洗劫一空。學校停課了，許多學生紛紛離開上海淪陷區。上海幾所教會大學校舍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就聯合起來，租了南京東路慈淑大樓繼續開課。他每天從滬西我們的家擠電車到南京東路教課。這樣一直維持到抗戰勝利。

約園風暴

1946年6月，父親在滬江大學任職十九年之後，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要聘他為副總幹事。他打算離開教學崗位，專任青年會的副總幹事的職務。事情尚未最後落實，十月間，顏惠慶博士突然來訪，使他感到很意外，因為他們兩人並沒有多少聯繫。顏惠慶博士是代表聖約翰大學校董會來請父親出任校長的職務，並和他作了長時間的談話，做了許多動員工作。顏博士認為父親擔任教學工作有二十七年之久，繼續做教育工作比青年會工作更為合適。不可否認的是，擔任聖約翰大學這座名牌大學校長的職務，對父親的社會地位來說，是上昇一步。但是，使父親更感興趣的是：當時華東幾所教會大學正在醞釀組織聯合大學，而父親對這項計劃，一向抱積極的態度，認為要辦好一所真正的好大學，必須集中人力和物力才能見效。與此同時，他感到：門戶之見很深的聖公會居然要他這個既不是聖公會成員，又不是聖約翰大學畢業的校友去當校長，說明一向保守的聖公會有了開明的傾向。在並不太瞭解該校內部的複雜關係的情況下，他接受了這項任命。

聖約翰大學由美國聖公會上海教區直接控制，實行的是主教制。主教掌握校內一切大權：組織、財政、宗教事務、擁有正副校長任免權等最後的發言權；而校董會、校務委員會只有諮詢、建議和管理具體行政事務有限的職能。一切重大的事情非經主教批准不可。聖約翰大學之所以長期不在政府部門立案，就是因為主教始終不同意。

1946年11月，父親正式就職，按聖約翰大學的傳統，就職典禮很隆重。當時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出席了典禮，並講了話，他指出中國進入憲政時期高等教育的重要性。他說：“沒有合格的公民，就不可能有有效、廉潔和民主的政府，任命涂羽卿博士為校長是開創了大學的新時期”（以上為中譯文）。顏惠慶博士代表校董會把紅綢裏的學校大印交給了涂校長。其實紅綢內是隻空盒子，以後的事實也證明只有空盒的“授印”，而無實權的交代。第二天，上海的英文報作了如下的評論：

“考慮到過去十年裡種種困難把持這座學校的大門，如戰爭時期遺留下來的問題，學校立案註冊的問題，涂校長面前展現的並非玫瑰花壇。凡缺乏膽量的人，在面對並要克服這些困難的人，必定三思而行，甚至拒絕接受這項重任。應該指出，在這座大學悠久的歷史中，涂博士是第一個中國人擔任這一職務。我們理解涂博士一向是幾所教會學校聯合的強有力的支持者，同時他也是致力于以基督教原則為人民服務的名列前茅的教育家。這些因素導致我們得到這樣的結論：在目前的情況下，他符合條件，非他莫屬”。（注，太平洋

戰爭爆發後，美國人校長卜舛濟 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 任命沈嗣良為校長，但未經校董會）。

青年會請父親出任副總幹事的希望落空了。他給熱情邀請他出任青年會領導職務的友人寫了一封信，信中表白了他當時的思想：

“1941 年夏，我患傷寒，幾乎瀕臨死亡，但奇跡般又戰勝了病魔。我不敢想象，如果當時我撒手人寰，我的妻兒將怎麼辦？上帝借我以更多的歲月，命我在人間負起更多的重擔。我接受聖約翰大學校長這一職務主要出於以下兩點：這所學校終於走出了狹隘的思路。我是一個和它毫無關係的人（指他既不是屬於聖公會成員，又不是該校校友，而聖公會過去一向門戶之見很深——注）。其次，我認為更重要的是爲了當前提出的幾所教會大學聯合計劃。如果我們基督徒能向世界表示我們忘記過去傳統的門戶之見，攜手爲建立新秩序而團結，那麼世界就有希望。也許這是我的夢想中的理想主義。但我並非盲目樂觀從事冒險。如果聯合大學計劃實現，我的任務就算結束，如果計劃失敗，我也不會因此失望”。

父親就職之後，我們一家搬進了約園，住在九號門牌，Old Walker's House，這是規定歷屆校長的住所。這所三層樓房，面對一棵巨大的蔥蘢的老樟樹。推開正房的窗戶，能見到它千百根樹枝像千百隻手臂伸向四方。它濃濃的樹蔭，覆蓋 一片芳草綠茵。草地靠西的一邊，微微起伏，是供洋教授打高爾夫球的場地。草地的最南端，有一泓流水。這棵上海灘上稀有的老樟樹是學校的標誌，是多少年來，讓這所大學的學子夢魂牽縈的形像。老樟樹週圍的南草地是學校的景點。課餘，教師和學生在這裡漫步消解疲憊或沉思遐想。可是，我們遷入約園後，父親卻沒有閑情逸致欣賞約園風光。他的面前，的確不是玫瑰花壇，不是芳草綠茵，而是一條極不平坦的道路。

他上任後，矛盾和衝突接踵而來。

他熱愛教學工作，當了校長，並沒有脫離教學。在繁忙的校務工作外，還教一年級和四年級的物理課。一年級是打基礎，四年級是畢業班，他抓兩頭。他倡議建立每週一次學生集會制度，經常親自主持，向學生傳達校政措施，教導學生勤修品學。他對學生非常關心，經常瞭解學生生活和學習的情況。在行政工作方面，他建議：整修思顏堂的中國教員宿舍；開設女生宿舍；開放學生課外活動；恢復《St. John's Dial》英文週刊；將交誼廳底層大廳改爲禮堂和各學會辦公之用；照董事會的決定，學校向政府立案註冊，這對歷史悠久的聖約翰大學來說是件大事。在他任內，立案工作終於順利地完成。他以淵博的學

識、卓越的才華和儒雅的風度獲得師生的尊敬。他說話多少帶有一點湖北鄉音，但一口流暢的英語，令人欽佩。

教學和校務工作已夠他忙的了。但是，為成立華東基督教聯合大學事宜，他經常要和杭州之江大學校長黎照寰、蘇州東吳大學校長楊永清商討並研究。這三所教會學校各屬基督教不同教派，而且創建已久，並有相當聲望，三合為一，談何容易。再加時局變化，更增難度，聯合大學計劃無法實現。

當時學校大權仍在差會（Mission，即教會派往其它地方的代表）手中，差會並沒有因為學校已經立案而放棄它對學校的控制，相反是加緊了。由於學生的課外活動的開放，在短時間內，學生組織了不少學會，如經濟學會、政治學會、新聞學會、物理學會、化學學會、讀書聯誼會等二十個左右組織。在各種學會組織的基礎上，1947年下半年，學生們開始醞釀組織全校的學生會。在召開成立大會之前，發生了風波。當時所有學會除政治學會外，都由進步學生掌握，政治學會分成兩派，選舉時，競爭相當激烈。父親思想開明，支持學生通過民主方式選舉。

1947年，內戰風雲，通貨膨脹，政府官員腐敗，引發各地學生運動迭起。強勁的學運風暴沖破了一向以不問政治出名的聖約翰大學的大門。父親意識到時代的潮流，把學生關在校園內，不問校園以外的事的時代已經過去。學生會主席和代表經常找校長提各種要求。校長定期和他們促膝談心。父親崇尚民主，認為建立民主秩序，必須有言論自由。他不斷引導學生，而不是以勢壓人。他經常在交誼廳或我家一樓和學生們舉行會談。大家無拘無束地向他敞開真實思想。他言辭懇切，真誠坦率，以婉轉的語言提醒學生要善於組織活動，注意保護自己，因而贏得學生的信任和愛戴。

全國的學潮一浪高過一浪。1947年5月，學生的罷課、示威、請願活動遍及全國。5月20日，武漢發生了國民黨軍警槍殺武漢大學學生的慘案，激起全國學生的憤怒。當時聖約翰大學尚未正式成立學生會，臨時組織了武漢大學慘案後援會。第二天，同學們將舉行罷課和出動宣傳隊，為醞釀罷課事，出現了兩派的爭執。父親一方面對學生的愛國活動表示一定的同情，另一方面，在雙方對立的形勢下，他極力保持校內的安定。為此，當天晚上和學生代表往返磋商，從晚上九點一直談到第二天的早上四點。1947年下半年，又發生了浙江大學于子三慘案。這時學生會已成立，於是響應呼聲更高，抗議力量更強，罷課問題又一次提出來。自學生會成立後，學生活動日益增多，活動的政治目的也日益明顯，校際聯繫也日益緊密，學生運動力量不斷壯大，引起差會方面的不安。

學生運動的高漲，國民黨鎮壓愛國學生的手段也越來越厲害，經常在大學內任意抓人。1948年1月29日，又發生了同濟大學事件。當時教育部堅持學生自治會的章程必須按照“整飭學風”的規定由校方通過，學生自治會的職員必須經校方同意，否則就要解散自治會。這件事當時在同濟大學引起激烈的鬥爭。各校學生紛紛起來支持同濟大學的立場。一天晚上，吳國楨市長辦公室打電話給父親，要他馬上到同濟大學去。那天晚上，我跟隨父親到了同濟大學，在校門口的一家小茶館裡看見吳國楨在裡面，也看到校內外佈置了大批軍警，荷槍實彈，如臨大敵，將整個學校包圍了。那時，來自各校的學生約兩千多人，正在集會，他們高聲唱“團結就是力量”。吳國楨命令學生停止集會，學生們堅持不散。最後吳國楨下令軍警闖入校內會場，強令停止開會，將學生驅逐到會場外，並按學校將他們分開。除逮捕被認為是負責人之外，其餘同學交給到場的各校長認領，予以釋放。父親當即決定按學生的圖書閱覽證認領。除女生由他親自帶領回校外，其餘男生讓他們自行回家或回校。同濟事件後，教會認為校長對學生沒有嚴加處理，極為不滿，學生敢膽大妄為，是校長縱容的結果。聖公會上海教區主教羅培德（W. P. Roberts）給紐約教區彙報的信中明確提出：．．．“有必要另找校長”。

聖約翰大學的學生多為富家子弟，對政治一向不感興趣，不參與，可是到了這時，由於時局的變化，學生的活動如脫韁之馬，很難控制了。差會和校長之間矛盾激化，在會上一再指責校長對學生“鬧事”軟弱無力。道不同，不相為謀。他和差會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父親忍辱提出辭職。校長辭職佈告張貼後，引起校內一片震動。

以後，父親給一個外國友人的信中提到處理學運事件時說：“整個事情歸結到今天的中國對學生問題採取甚麼樣的政策。我採取的是開明的政策，要懂得學生的心理，他們思想上受到困擾的各種因素，他們的弱點和錯誤。然後力圖通過友好的接觸，真誠的勸導和科學的說理引導他們。高壓政策的禁止和脫離他們的態度，對我來說是執行一種危險的政策。後者可能效果快，但也可能引起突發事件。前者是個緩慢的過程，但我相信最終會培養更好的精神和品格”。（原信是英文，以上是譯文）

沉重的十字架

父親辭去聖約翰大學校長職務的消息很快傳到北美，基督教青年會北美協會如獲喜訊。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的總幹事的職務空缺已久，原來就打算請父親擔任，但是，聖約翰大學搶先了一步。父親和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以下簡稱青年會）的淵源很深。早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他在南京東南大學和上海滬江大學任教的時候，曾擔任過青年會的董事。

父親身為基督徒，是一位在學生中享有威信的教授，業餘在青年會擔任工作深受讚賞。三十年代中，青年會請他和福州協和大學前代理校長陳文淵博士，長沙藝芳女校校長曾寶蓀女士（曾國藩曾孫女）組成巡迴演講團，到十三個城市，做歷時三個半月的講演，聽眾達十五萬九千人左右。父親的講題是“科學與宗教”。他是個科學家，又是基督徒。外國朋友稱他為基督徒科學家（Christian scientist），他稱自己是科學的基督徒（scientific Christian）。他認為，信仰宗教又推崇科學，看起來這兩者之間有矛盾，但是，它們之間有共同點，即：力圖探索自然和生命之謎。任何宗教是人類力圖解釋迄今人類未能解釋的現象的意願。自古以來，西方的自然科學家包括哥伯尼、加利略，不僅信仰宗教，而且本人是修道士。他積極參與青年會工作是為借助宗教，鼓勵青年吸取現代文明，以科學為基礎，改變封建傳統，建設現代文明國家。

抗日期間，他和青年會同仁做了大量救亡工作，青年會把總部搬到重慶去之後，他擔負起留守上海的任務。勝利後，總幹事梁效初先生退休。總幹事的位置空缺。父親辭去大學校長職務後，青年會聘他為全國總幹事是順理成章的事。

他出了聖約翰大學的大門，踏進了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的大門，從此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1948年9月中旬，北美青年會邀請他到美國訪問，並考察北美青年會工作。他先訪問加拿大，然後訪問美國各地。此時，中國的局勢正在經歷急劇的變化。1949年1月中旬，他乘船取道香港回到上海。

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作為一個宗教團體的領導人，他不能不想到青年會的命運以及共產黨執政後，宗教在中國將面臨什麼樣的考驗？他想起，1939年，青年會總部搬到重慶去後，曾有一個基督教代表團，從重慶到西安，通過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由周恩來、博古和林伯渠三位共產黨領導人陪同到延安訪問。他的老同事江文漢是代表之一。江先生在他的“延安朝聖記”一文中，頌揚了延安精神，認為，中國共產黨站在勞苦大眾一邊，這種精神和基督的精神一致。毛澤東主席會見他們時，十分肯定地對他們說：中國共產黨堅持宗教信仰自由。抗戰勝利後，聖公會主教還曾收到過由周恩來、董必武二位中國

共產黨駐重慶代表團的領導人署名的信，信上說：“如果你們獲國民政府允許，派牧師、醫生、教育家來我們地區參觀，或建立教堂、醫院及其他慈善機構，你們將受到歡迎。我們將努力為你們提供方便，我們特別希望你們對改進我們的工作提出忠告。”（注：此信為英譯文，日期 1946 年 2 月 26 日，送信者為 Pu Hua-ren，以上由英譯文再翻譯成中文）這些事實使他相信共產黨是不會食言的，特別是，在全國尚未完全解放時，中共中央邀請了吳耀宗先生等宗教界領袖去北京共商國是，起草共同綱領。

儘管如此，解放後全國青年會的工作處境十分困難。由於宗教信仰和共產黨理論基礎馬列主義相左，馬克思主義視宗教為鴉片，青年會過去和美國關係很深，部份經費來源依靠外國。他感到壓力相當大。青年會員面對現實，參加政治學習後，紛紛離開青年會。想爭取入團、入黨的會員必然和青年會劃清界限。青年會在新中國建立後還想有所發展是不可能的。但當時許多基督教人士認為基督教信仰的基本內容能夠，也必須和新民主主義相結合。於是，父親和一批宗教界人士紛紛出動，到許多地方宣傳新中國的宗教自由政策。1950 年 5 月，周恩來總理先後三次接見基督教界人士共十三個小時，最後一次從晚上十一點到凌晨四點。周總理明確表示新中國保證宗教自由，但是，基督教必須在內部肅清帝國主義影響，割斷與帝國主義的聯繫。聽了周總理的講話，父親對中國的基督教會的前途抱樂觀的態度，對青年會的前途更抱有希望，因為青年會不同于一般宗教團體，它致力於社會服務，深得國民好評。特別是，周總理提到他的青年時代在天津參加過許多青年會的活動，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是羅伯孫博士（Dr. Robertson）的科學講座。那時有許多青年會會員參加了五四運動。周總理還感謝青年會為人民政府培養了許多幹部。

抗日時期，青年會會員投入大量的救亡工作；解放戰爭時期，青年會在國民黨統治區以各種方式支持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學生運動；特別是上海青年會為中共地下黨提供了活動場所。青年會為它的青年幹事爭取獎學金到美國深造，實際上它送出去留學的那批幹事是中共地下黨員。這幾位到美國留學的幹事才華出眾，在美國深受青年會國際委員會的高度評價和讚賞。日後，他們成為新中國出色的國際活動專家，難怪周總理要向青年會表示感謝。

周總理接見後，中國基督教領導人發起“三自愛國運動”即“自治、自養、自傳”。緊接，朝鮮戰爭爆發了。這時，中國和美帝國主義斬斷羈絆迫在眉睫。九月，由吳耀宗先生起草的“三自宣言”發表在人民日報的第一版。中國基督教領導人分別到各地宣講“三自

宣言”。父親到了金陵女大、南京青年會等地宣傳愛國愛教，中國基督教會只有自治、自養、自傳才有出路。

這一年裡，父親深感是他有生以來在生活中最迫切需要作各方面的調整的時期。和解放相比，他所經歷過的辛亥革命、國內戰爭、抗日戰爭，只是物理學上的子波而已。新的思想、新的哲學與信仰、新的生活方式的衝擊是任何在中國大陸上生活的中國人躲避不了的。他每天面臨新的挑戰。他不斷思索，努力學習，竭力適應新的環境。學習和開會佔了他全部時間和精力。他對新政權有信心。他認為新政府的經濟政策趨向勞動果實的公平分配是很正確的。作為一個科學家，他日益接受辯證法哲學。經過舊社會腐化叢生、民不聊生的日子，解放初期新社會氣象一新，給了他信心。至於他個人，需要思想改造，跟上形勢，也是逃避不了的現實。

1950年，上海滬江大學校長職務空缺。校董會提了三位後選人：即被日寇殺害的劉湛恩校長的遺孀劉王立明女士，涂羽卿和聖約翰大學教授陳仁炳博士，提交華東教育部門審批。審批的結果，同意父親出任校長。（注：見漢森教授著《滬江大學歷史》第188頁）但是，父親有自知之明。經歷過當聖約翰大學校長的慘痛教訓，他婉拒了這項任命，仍留在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幹事的職位上。

朝鮮戰爭的烽火燃起，殃及到和美國有千絲萬縷關係的中國基督教界是必然的趨勢。中國基督教界必須不遺余力對美帝國主義口誅筆伐，在內部肅清它的影響，挖掘它的代理人。於是，人人過關，重點打擊。1951年4月，父親出席了“三自運動”在北京召開的全國基督教集會。大會支持政府政策，響應抗美援朝，擁護土改政策。會後，拉開了各地教會控訴鬥爭的序幕。各地的宗教團體、教會大學、醫院，凡是和教會有關的單位控訴美帝國主義的罪行的集會和遊行如火如荼，打倒美帝國主義的口號震耳欲聾。

我父親過去和美國教會有密切關係，母親是美國人。解放前夕，父親還去過美國，這些客觀條件，把他列為需要交代的重點分子，自不在話下。他清算自己幾十年來和美國教會的關係，控訴美帝國主義在解放前利用青年會的陰謀，當然他不敢提及青年會也為中共地下黨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活動場所。他從根子挖起，檢討自己的政治立場。他從小在教會學校上學，兩次留美，前後共七年之久，一直和教會保持密切關係。批判他親美、崇美超政治和普世教會的錯誤思想。1948年，在聖約翰大學當校長期間，美國駐中國大使司徒雷登（曾任燕京大學校長）策動滬寧一批基督教領袖去見蔣介石。蔣是個基督徒，他們曾妄想對蔣能起一點作用，勸蔣放棄鎮壓共產黨，接受和平。以金陵女大校長吳貽芳女士

（解放後曾任江蘇省副省長，和宋氏三姐妹是好友）為首的基督教代表團去南京見了蔣介石。父親是該代表團成員之一。吳貽芳是代表團發言人。蔣非但不理會他們的意見，反而要他們像天主教那樣，發表一個支持國民黨政府的宣言，代表團沒有接受。

1950年2月底，他曾和廣州青年會總幹事王以敦先生同去香港和北美協會代表討論中國青年會三年經濟自養計劃。實際上，這次去港是由周恩來總理親自批准，由父親以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幹事的名義去執行一項任務，由於任務性質有特殊性，當時不便公開活動內容。後來得知，當時青年會在香港有一筆外匯，要父親親自去取回，因為建國初期，中國需要外匯。這些都是他主動交代的。他滿以為把事情交代清楚，從此可以輕裝前進，但是所有他的交代日後卻成了一次又一次攻擊他的砲彈。

1951年底，“三反五反”運動開始，父親被打成“大老虎”，大會小會輪番鬥他。他因過度緊張導致胃出血，大口吐血。母親感到他身體情況危急，不讓他出席會議，要送他進醫院。但是青年會負責運動的那幾個“積極分子”哪裡肯放過他？硬把他從床上拉到會場上，在會上指控他和帝國主義分子有不可告人的關係。讓他痛心疾首的是，向他發難的是三十年代他在滬江大學的學生，又是他手下幹了多年，青年會派出留美的得力幹事，在他心目中他們是虔誠的基督徒，可是他們的表現完全違背了作為基督徒的原則和做人的良心。應該說，他們對父親是十分瞭解的，但是，這些棍子恰恰是他們打在他頭上，心中痛處無言以表。父親本是一介書生，不懂階級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

父親在人格上受到極大的侮辱，產生了自殺的念頭。他企圖從六樓的窗口跳下去。就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刻，被母親拉住，動情地勸他千萬不可輕生，她又把他弟弟夫婦請來做他的思想工作。他們兄弟感情篤深，弟弟勸他必須活，證明自己清白，一死不能了事。他聽從家人的話，支撐下來。青年會搞運動的當權者，仍不罷休，把他和副總幹事江文漢先生兩人關在辦公室內，勒令交代。

很巧，我的一位堂兄，涂長望，前國家氣象局局長，因公到上海，聽到父親被打成“老虎”，感到吃驚。他這位叔叔既不是資本家，又不是黨政幹部，怎麼會整到他頭上。他不相信父親涉嫌“三反”、“五反”任何一項內容，而這種情況發生在父親列席了政協第一屆第三次會議之後不久，他感到事情的蹊蹺，立即向華東局反映情況。上面發了話，青年會那幫打手才高抬貴手。這時候，國外已謠傳涂羽卿被捕。

在這一沉重打擊之後，父親情緒消沉。當時上海市長陳毅接見了他，鼓勵他向前看，並把他自己在黨內曾經受過委屈的事告訴他。母親希望他早日離開青年會，遠離那幫

人。他請求辭職，但上級出於統戰的考慮，沒有同意。他名義上還是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幹事，實際上青年會的事務由不得他了。青年會成爲民主青年聯合會的一個成員。每天上班看報學文件，過 從未有過的清閑日子。

他當選爲全國政協第二屆委員後到北京開會的機會多了。有一次，會議期間，周總理見到他，過來和他親切握手說：“涂博士，你也換上人民裝了”。總理記憶力驚人，他記得，在他和宗教界開會時，父親總是一身西裝。從穿西裝改爲人民裝很容易，改造思想，要脫胎換骨很困難，也很痛苦。但他經受了這次嚴峻考驗，決心盡最大的努力跟上新時代對他們這批舊知識分子的要求。

作爲政協委員他經常有機會到各地參觀，他看到祖國的建設和進步，他慶幸自己還有一份力量貢獻給國家，那就是重返教育園地去精耕細作，爲國家培養人才。他的老友陳鶴琴先生在江蘇省負責教育部門工作，1954-1955 年，聘請他到南京師範學院教物理，1955-1957 年，在蘇州師範學院教物理。他不辭勞苦，每週往返在滬寧線上，但又能和學生在一起，帶領他們在實驗室裡操作，心情很舒暢，把過去的事置之腦後。

短暫的寧靜

1957 年，他已過了花甲之年，被調任上海師範學院物理系主任。基本上脫離了青年會，搬出青年會的宿舍。六十年代初，爲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把他的家搬到淮海路上的淮海公寓。但他還掛 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幹事的職務，需要他簽名時，他就簽名，需要他出席會議，他就出席。他心明肚白，他仍坐在這個位子上，是向全世界說明，中國有宗教信仰自由，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仍然存在，基督教青年會畢竟是個世界性組織；更重要的是，它是對外宣傳的一個窗口。直到他去世，他一直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幹事，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常委和全國政協委員，一個無黨派民主人士。

重返教育崗位後，父親過了幾年安穩、舒心的日子。歲月的消逝，他教學的熱情並沒有絲毫減弱。他雖然頭髮花白，但身子骨很硬朗，腰板很直，沒有慢性病。每天他準時夾 那隻陪伴他幾十年的公事包走出家門，擠上兩輛公共車趕到學校。他爲青年教師開設

原子物理和量子力學課程。他的英文造詣很深，還能閱讀法文、德文和俄文科技資料，業餘時間埋頭為學生們翻譯外文參考資料。母親也被請到華東師範大學教英語。

經過 57 年反右派運動，58 年大躍進運動以及隨之而來的三年困難時期的幾番折騰，全國知識分子噤若寒蟬。父親也越來越沉默寡言，整天埋頭工作。他已到古稀之年，有了第三代，週末，有兒孫繞膝，享受天倫之樂，為他們的老年生活增添幾許溫馨和樂趣。他唯一的願望是把餘年貢獻給教育事業，在有生之年多培養一些人才。

在劫難逃

誰知好景不長，事與願違。1966 年，文化大革命的暴風驟雨把他從講臺上拉了下來。忽然間，學校裡出現鋪天蓋地針對他的大字報。這些大字報並非學生們寫的，而是從青年會和三自愛國運動會送到學校的。大字報揭發他是帝國主義的走狗、代理人、是埋伏在中國基督教內的特務。顯然這次有人要把他徹底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學校裡的“革命小將”立刻對他採取行動。前奏是抄家。

家裡來了一批紅衛兵。把父親打了一通，老先生是個溫文爾雅的人，任他們打，悶聲不響。緊接 是對父親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名曰把他送進了學習班，實際上對他實行隔離審查。由於受不了人身侮辱，他趁上廁所的機會，用剃刀割頸上的動脈。被發現時，他已大量出血，昏倒在地。學校把他送到醫院搶救。他醒來之後，見到身旁的妻子女兒，對她們說，他萬念俱灰，沒有活下去的願望。經學校同意，他出院後回家養病。從此，他終日緊鎖雙眉，沒見他有過半絲笑容，確實活得很勉強。不久，他又得了一次小中風，行動困難，說話聲音很弱。

自從父親從醫院回家後，母親滿以為事情就這樣過去了。但是她的盲目樂觀很快破產了。他們所住的大樓裡，有些住戶是高級知識分子，1968 年，清理階級隊伍開始後，接連有人跳樓自殺。母親開始覺得情況嚴重。7 月，忽然來了幾個人，在他們家門上貼上封條，然後把他們兩人帶到上海師範學院，分別隔離。九個月之後，母親被遣送回家的同時，父親則被送到香港路 59 號（原為銀行俱樂部——注）“上海市基督教界學習班”，所謂學習，實際上是一種鬥爭。曾任金城銀行總經理的徐國懋老先生在他《八五自述》一書中

描寫了這個所謂“學習班”的情況。徐先生曾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的董事，所以他也被拉去參加“學習班”。書中寫道：

“學習班要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是有些教會負責人接受前燕京大學校長，後曾任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的領導，組織政黨，反對共產黨，走‘第三條路線’。主要審查對象是兩個人：涂羽卿和吳高梓。涂羽卿已被隔離在香港路 59 號地下室多時，學習班有時傳他來，叫他交代這個陰謀活動的情況。他態度堅決，說他和司徒雷登只是相識而已，沒有深切關係，也根本沒有另組政黨的事。他的問題早已交代，沒有什麼可說的了．．．涂不多說，不承認”。從在學校隔離到“學習班”隔離，說明父親的問題又升了一級。

參加這次學習班的有基督徒二百人左右。大部份人晚上可以回家，重點分子不準回家。地下室臨時用書架隔開，給每個“牛鬼蛇神”夜間住宿的一席之地。監管這一批人的是上海市黃浦區工宣隊進駐基督教界的小分隊。學習班的會上，三自愛國運動的某些人聲嘶力竭叫父親交代和美帝國主義“不可告人的勾當”。他一看，還是五十年代鬥他的那批老人馬，他心中自然十分反感，他的聲音雖然微弱，但回答很堅決：他沒有背叛祖國和人民。他們殘酷鬥爭這個七十多歲的老人還不罷休，明知他體弱有病，會後還要他幹體力勞動。他一生從不養尊處優，不怕幹體力活兒，但這場“革命”已無情地摧殘了他的身心。一次，他在打掃衛生時，發現一塊鐵片，拾了起來，放進口袋，這一舉動被發現後，又挨鬥了一整天，直到他昏倒為止。當晚，一位睡在他隔壁的難友林永侯先生聽到他整整呻吟了一夜。

1969 年 11 月，父親被關進在漕溪路上的前上海市少管所。他的問題又升了一級。當時這個少管所，已被空軍部隊接收，專門囚禁重要的政治犯。以後獲悉，京劇大師周信芳、前上海音樂學院院長賀綠汀、著名演員趙丹、白楊和作家杜宣，當時都曾囚禁在這監獄裡。進了這個地方，都以號碼代替名字。以後，他又被轉移到虹橋機場附近好似監獄的地方，帶上手銬，過 罪犯的生活。在嚴厲的逼供之下，他的精神徹底垮臺，承認了誣告他的罪名，但又苦于編造不出具體內容，痛苦折磨 他，無法解脫。

1970 年，春節過後，我整個冬天在機關燒鍋爐勞動，獲得幾天假期，決定到上海去探望已被監管很久的父親，並想弄清父親究竟犯了什麼“罪”。到了上海，費了一番週折，獲准到香港路 59 號見父親一面。見到父親那一剎時，我楞住了。在我面前的是個穿破棉衣，面容憔悴，毫無表情。目光痴獃的老頭。父親望 兒子發獃，說不出話來。幾天後，工宣隊召集在上海的家屬：妻子、女兒、兒子辦了一個家庭學習班，促他交代“問

題”。父親的專案組組長是我們一家很熟悉的一位。他陰沉 臉主持會議。老人一語不發，神情怪異，我的兩個姐姐都是醫生，感到父親神經已不正常。會後建議給他檢查身體。她們得到的回答是：“他能吃，能睡，沒有毛病，你們不必操心”，還說：“涂羽卿態度極為惡劣，每次叫他交代問題，勒令他第二天寫完，他交上來的紙上只有四個字——最高指示”。

1970 年 5 月，母親最後一次獲准給他送食物去。無情的歲月在這七旬老人的臉上深深刻下了道道紋路。她躬 背，提 東西，擠上公車，從淮海路到香港路去送東西，一次又一次被拒絕。這時候，他們只有三十五元的生活費，她自己生活水平已降到最低水平。

整整兩年多，母親不能給父親送東西，也沒有人像過去那樣定期來向家屬收糧票、油票，拿換洗的衣服。父親下落不明，母親心中起了疑問，莫非人已不在人間，即使人死了，也該通知家屬去收屍吧。這種生死兩茫茫的日子很難熬，母親性格非常堅強，她定要弄個水落石出。1972 年初，她又去香港路詢問，得到的回答是三個字“搬走了”，再問：“搬到哪裡去了？”，回答仍然是三個字“不知道”。她先後走訪、寫信給有關單位，從未得到一個字的答覆。其實父親早被關進了監獄，前次家屬要求見他，是把他從監獄裡帶到香港路來會見的。他決不是像那些人所說的，能吃、能睡，沒有毛病，而是連續幾年的冬天，他都患肺炎，住進離家只有兩站路的華山醫院，但從不讓家屬知道。他們把他當作“要犯”放在單人病房內，門口有解放軍把守。

1972 年，國際形勢有了變化，美國尼克松總統的來訪，打開了中國這扇封閉了二十多年的大門。中美關係開始解凍，9 月，我到國務院來訪處反映情況，要求瞭解父親的下落。11 月 23 日，這一天正巧是感恩節，母親突然接到通知，叫她到香港路學習班的地點去接父親回家。父親事先並不知情，車子經過他家的弄堂口，又把他送到香港路，他身子涼了半截，以為又將面臨一番批鬥。原來那幫人怕家屬知道他是從監獄裡放出來，所以繞了一大圈子，故意把他先送到香港路學習班的地點，然後讓母親把他接回家。

回家後，父親的心始終沒有得到安寧。因為他的問題沒有解決。當局究竟把他看成是個什麼樣的人？每月他仍然只拿 35 元的生活費，學校裡沒有一個人來探望他。這說明他還是一個沒有結論“掛起來的人”。在他回家之後，精神失常的表現越來越明顯。經家屬要求，上海師範學院開了證明，送他去上海精神病院就醫，診斷結果，他確實患有精神病。家屬一再要求給他做書面結論，解除他思想上的負擔，有助于他的疾病的治療。他的

問題是上海基督教界當權者給他立案審查的，但組織上他屬於上海師範學院，他該歸學校管，由學校出面處理他的問題。

1973年，春節前，上海師範學院終於來了兩位代表，奉上級指示，向他作口頭宣佈。“你的問題，根據現在掌握的材料，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過去有文字的結論都可以作為一張廢紙，如今沒有任何文字說明的口頭宣佈，任何時候都可以不予承認。聽到這樣的口頭宣佈，他本人和家屬心裡怎能踏實？最後，兩位代表還對他說：“至於你隔離時的情況，沒有必要對別人講”。這種帶威脅性的口吻只能使他已有的沉重壓力更加沉重。他的疾病日益惡化。事實上，我們作為子女，一直想瞭解他被隔離時的遭遇，老人總是吞吞吐吐不敢直說，斷斷續續，得知他是被監禁在牢裡，受過拷打，帶過手銬。以後和他同時監禁在少管所的林永侯先生（林則徐的第五代孫，父親的一個學生）透露說：“由於涂老晚上哭、喊、呻吟，大冷天晚上，罰他帶手銬站在露天，以至於得過幾次肺炎”。儘管母親和我在上海的姐妹對他多方精心照料，給他人間的溫暖和愛，深情地勸他安心養病。但他的問題一日得不到解決，他一日不安，病也治不好。反人性的誣陷和背叛，使他被損害和被侮辱的身心全線崩潰，和疾病作鬥爭的意志和力量喪失殆盡，就像徹底被毀壞的一臺機器，無法修復。

1975年夏，他又患肺炎，氣管被痰堵住，不能正常喘氣。醫生要切開氣管，插入管子把痰吸出，他央求醫生，不必搶救，費勁地吐出幾個字：“讓我走吧！”。醫生給他動了手術，以後幾個月，他一直住在華山醫院，再也沒回過家。他眼巴巴期待還他清白的願望落空了。1975年，9月11日中午，他帶心靈深處的創傷離開人間。

從父親去世後到1979年，整整四年，為了還父親以清白，我們四個子女為父親的一個書面結論奔走，雖然遇到種種阻擾，但我們決不罷休。作為父親的專案組長李XX當然不願痛快地承認這是個錯案。特別是在文革之後，他又獲重任。我們兄弟姐妹四人費盡週折，得到了一張紙，上面寫道：“由於林彪、四人幫極左路線的干擾和破壞，認為涂羽卿同志作為美特嫌疑而立案隔離審查是錯誤的。所謂基督教美特潛伏組織是一起假案，應予否定”。這張紙對逝者，已無意義，對活人的略有安慰，可是，子女們的心靈深處的傷痕已無法彌補。

1979年11月2日，上海師範學院為他舉行骨灰安放，平反昭雪的儀式，把他的骨灰安放在龍華烈士陵園。母親從不讚同任何殯葬儀式，但這次破例，因為這不是單純的骨灰安葬，而是為父親平反昭雪，讓她子女解脫苦惱。在她心中，無論是平反還是不平反，

父親永遠是個坦蕩的君子。我們一家三代人、父親生前好友及其子女，同事、學生，鄰居前來送花致哀。母親唯獨謝絕了四個人的花圈，她不願這四個名字在父親靈前出現。她相信父親在九泉之下看到這幾個人的名字會有極大的傷痛。父母親多年的老鄰居周谷城教授親切地用英語對母親說：“你的丈夫是個正人君子，是個真正的基督徒”。母親噙淚花驕傲地回答：“是的，他愛國、愛家、愛學生、愛朋友，他撒向人間的一片愛心永留我們心間”。

父親雖入土但未安。

當我們在海外查閱到當年有關的記錄、在國外保存的他與友人的通信、父親的文章，以及友人和他的學生們所寫的懷念他的文章，他的心路歷程，他的拳拳愛國心，字字句句躍然紙上。回顧和記敘這位值得我們尊敬的長者的經歷，是個痛苦的過程。我們回憶的不僅是一個家庭的苦難，而是千千萬萬忠心耿耿、優秀的中國知識分子的苦難歷程，我們民族慘痛的歷史教訓。

涂繼正 李宜華 寫于 2007 年 2 月，加州